



在江苏吴江江村群学书院访学，遇见古国治先生。古先生戴着老式鸭舌帽，一身中式藏青色布衣，叼着古典大头烟斗，总是笑眯眯的，祥和庄重，儒雅睿智，谈起话来，从容和缓，娓娓道来。古先生总让人想起同爱叨烟斗的林语堂先生来。

古先生追随南怀瑾先生数十年，在教育上得南老师真传。他在多处进行过演讲。在如何关爱孩子上，他有两个观念这里值得一讲。第一个是：功课重要还是关系重要？永远是关系重要。如果为了孩子的功课学习，家长把与孩子的关系搞坏了，就糟糕了。一旦父母子女关系不好了，就不是理性的问题了，你说得对也好错也好，他们都当作耳旁风。师生关系亦如此。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强调的“关系型教育”，有了良好的关系，才有教育。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谋而合。

另一个观念是：种树，是整土还是整苗？种过树、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，土松好了，灌溉好了，肥上好了，苗自然好长。若一不小心动了苗，问题可就大了。虽然树也需要修剪，但只是在适当的时候。用到教育子女上，这里的“土”，按照古先生说，就是父母。父母管得太紧，“泥土太紧的话，苗就长不好”。所以，给孩子松松土，给他们自由空间，别处处限制、处处约束，总之，提供一个有阳光雨露、空气温暖的环境，让他(她)自己长，成长永远没有人可以替代，而且不要天天去看，那样好像老见不到成长、变化。郑也夫先生近些年提出消极教育观，就是针对当下家长、老师对学生干预太多、过于积极这个问题的。

家长满足孩子的要求，或者表达爱心，会有给予。我们知道，给予本身就是一种干预，它会改变对方的心理、期待和行为。不管是家长，还是教师，通过奖惩，每天都在“给予”学生和孩子些什么，正如郑也夫先生在《文明是副产品》一书中所说：“父母的过分给予也是问题产生的主因。父母肯定是要给予的，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该给则给、不该给则不给的原则以及分寸问题。”幼年时、困境中，过分的给予会腐蚀他们的自立，溺爱——父母过度的给予，使孩子背离了常规，会造成孩子发展的异化。

在江村访学的时候，我和友人讨论起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80年前赴英国读书之前在江村调研的事情。这个研究是发自他内心的兴趣和愿望，而不是外来的任务，所以成就了经典著作《江村经济》。说到这里，姚富坤先生引用了江村当地一句俗语：教出来的是臭气，想出来的是智(志)气。有人说是“智气”，有人说是“志气”，“智气”是智慧，“志气”是志向或者意志，不管哪个，都比“臭气”好。也就是说，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，是自己“想”出来的，不是老师指派的，所以饱含“智慧之气”，或者“志在富民”的“志向”，从而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著作。

人才成长不是可以具体计划的目的性产物，而是复杂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人才一样也是“副产品”。往往那些计划出来的产物看似积极，实则“功利短视”。在《吾国教育病理》一书中，郑也夫说：“对人的发展，对创造力如何发育，承认自己无知，稍事避免莽撞，可能更明智和可取。我以为，人类的能力中最微妙的是选择能力……天才人物的选择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，早年在选择上受到的帮助越大，很可能越难发育出自己的选择能力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孩子的成长过程，如同树苗成长一样，家长尽可能做好整土工作，少去整苗。家长少些干预，孩子多些自由，才是时下教育需要注意的。

(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)

【窥海斋】

## 不做家务错在哪里

□林少华

恕我动不动就显摆自己：迄今为止，即使往少里说，我也翻译了七八十本书，自己写了七八本书，还为提职称写了十七八篇论文。于是，演讲“互动”时有人好奇，问我日常生活中如何安排时间，或者索性问我这些所谓成果是怎么来的。“毕竟你的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，要上的课，要开的会，要填的表，你怕是一样都少不得的。一年对谁都是365天，一天对谁都是24小时……”我如实相告：周六周日双休日对我不存在的，寒假暑假大小长假对我也形同虚设。早上起床不迟于六点半，晚上睡觉不早于十一时，不看电视，不玩手机，不吃请，不请吃……回答到这里，堪称无懈可击。只有一次画蛇添足，道出一个“秘密”：基本不做家务！

翌日我又把这个“秘密”写成微博广而告之。结果，完全始料未及的状况发生了：不出两三个小时即有两三千条跟帖。跟帖者中大部分显然是女同胞，女同胞中大部分可能是女性主义者(或女权主义者)。她们开始全面围攻，劈雷闪电，风雨交加，态度之激烈，用词之尖刻，手法之决绝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电脑界面闪烁最多的字眼是“直男癌”。“直男癌”？“直男癌”是什么？我全然摸不着头脑。问正在做家务的家人，得知是指不做家务的铁杆大男子主义者。

问题是，不做家务错在哪里？不做家务就是大男子主义者了？我仅仅是说我这个男人不做家务，并不是号召天下所有男人们都不做家务，不是鄙视家务、仇视家务。再说，又不是她做家务的时间里，我架着二郎腿歪在沙发上打瞌睡或逗猫玩儿。她吭吭哧哧拖地板，我吭吭哧哧爬格子；她吡吡唧唧洗

碗碟，我窸窸窣窣查辞典；她翻箱倒柜晒衣服，我搜肠刮肚写文章——无关乎高低贵贱，不过是家庭分工不同罢了。莫非你想说前者劳累后者轻松？那可未必哟，至少搜肠刮肚未必比翻箱倒柜多么让人心旷神怡。不信你试试？噢，想起来了，招研究生面试的时候，如果成绩相差无几，作为我，的确是优先录取男生的，并且不止一次这么宣布过。但那也和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没有关联。之所以如此，其因有二。一是有单位屡屡向我“订购”男生，无论我怎么强调女生出类拔萃、闭月羞花都不为所动；二是好心解决女生终身大事。你想，年年招个“女儿国”，“女儿”如何嫁得出去？坐等唐僧路过抢婚总不是办法嘛！况且，作为男性教师，年龄再大，也不至于歧视女生——面对如花似玉、满面笑容的女生讲课，肯定比面对男生心旷神怡的嘛！浮想联翩之下，没准超常发挥。

总之一句话，不做家务同性别歧视不相干。再说，不做家务只是促成我翻译七八十本书和写七八本书的一个因素，而且不是主要因素，我更没强调二者的必然性和四处推荐。是的，作为泛泛之论，二者未必构成因果关系。举个例子，成了日本大作家的村上春树是做家务的，甚至为没有做好而受到夫人村上阳子的训斥：“怎么搞的，抽屜开了也不关上？哼！”中国大作家莫言做不做呢？确凿证据固然没有掌握，但根据常识推断，农村出身的他当年讨个城里媳妇，死活不做家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做家务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甚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，有人不做家务而止于不受待见的翻译匠并因此被批得体无完肤。

然而我并没有吸取教训。日前应邀去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摇唇鼓舌，“互动”时同样有人问起开头那个问题，我的回答又差不多如法炮制。晚间“吃请”，邀我去的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杨承淑女士坦言她也不做家务：“我是研究学术的人，让我用研究学术的时间做家务，那是多大的浪费啊！”我问，那么是您先生做喽？她说先生有时候做一点儿，更多时候是请人做。同席的外语学院教授兼院长(男)插嘴道：“杨教授几乎周六周日都在所里，一门心思搞研究。我们都叫她‘学术修女’。”

看来，包括男人在内，没有哪个人对杨承淑教授不做家务有意见。不但没有意见，她的男性同事还一副赞赏有加的语气。相比之下，我不做家务却受到了网上无数女性的抨击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究竟错在哪里？

“来美国生活，令人佩服的就是对上述男女平等主义(feminism)的强烈关注，或者不如说男女平等这一观点早已牢牢植根于生活之中。比如用英语交谈时，一不小心把anyone(泛指的人)换成he(他)，必定有人提醒。spokesman(‘发言人’，带有男性色彩)改为spokeperson(中性色彩)，chairman(‘主席’，带有男性色彩)变成chairperson(中性色彩)——这类事情已经成为常识。”村上春树在《终究悲哀的外国语》中这样写道。中国也将变成这般有趣的社会？

也罢，有备无患，往下我也改邪归正，乖乖做家务就是了。翻译之余做家务，家务之余搞翻译。齐头并进，互利双赢，皆大欢喜，不亦可乎？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、著名翻译家)

【社会观察】

## 教育如种树，整土还是整苗？

□陈心想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  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  
本版编辑：孔昕  
美编：牛长婧